

歷史與歷史學

何兆武 著

0

27

OXFORD

歷史與歷史學

何兆武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mbay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5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歷史與歷史學
何兆武 著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 19 587556 7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
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序

從昆明到紐約

王浩

抗戰期間本書作者和我同學多年。在西南聯大幾個好友之間常把不是單名的加以簡化，不過不是照慣例把姓省去。我們叫作者何兆，把武字略去了。

對於西方史學思想及中西文化交流，我雖然有些業餘的興趣，卻從來沒有認真作過研究。所以何兆許我隨意寫。我想回憶幾件和彼此有關的舊事，藉以反映一代人研習文科的經歷。——除了在昆明多年常見面以外，1980年和1984年何兆來紐約，交談不少。

出生在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主要的興趣在思想及理論，對於實際行動缺乏能力及願望，又留戀尋求通識的理想：大體上這是我所想到的一類人。每個人的情況在大同中又有小異。例如我於廿五歲出國留學而何兆留在中國，以後的境遇有很大的差別。

三十年代的風氣是工科至上，大部分分數高的中學生都計劃進工學院。1939年何兆考進西南聯大工學院，但因為自己在古老的北京長大又遇上多變的戰爭時代，次年決心轉入歷史系。我於同年入數學系，而希望研究哲學，以為數學是一項基礎。本科畢業以後我們同時考進清華哲學研究所，何兆不久發現內容和他預期的不合，於次年轉入歷史研究所。

在做研究生的時期，有幾件事多年以後仍然記得。有一次何

序

兆弄到一個留聲機和幾張唱片。我在他房裏初次接觸到西方古典音樂，覺得非常好聽。還記得當時聽了莫扎特的小夜曲。後來我到了美國，和一位外國同學談到我喜歡這一作品，他似乎覺得我趣味不夠高。

當時都喜歡看些雜書，有時也引幾句。有一次何兆提到羅素是乾的幽默，弗洛伊德是濕的機智。又一次他引述三種愛情：兩獸相遇；尋求溫暖；互相創造。大意是說最好三種都有。

有兩件事我當時曾告訴何兆，多年以後他又提到，我發現當年對兩位老師的話，瞭解得很不夠——1945年後我的碩士論文答辯時，沈有鼎先生問我為甚麼要學哲學，我說因為對人生問題有興趣。沈先生說，在西方針對人生問題的是文學，不是哲學。有一次馮友蘭先生對我說，每個對中西音樂都熟悉的人，都會更喜歡西方音樂；每個對中西哲學都懂的人，都會更喜歡中國哲學。

1949年以後何兆作了不少翻譯的工作，包括羅素、盧梭、帕斯卡、康德、柯林武德、李約瑟、波普爾、梅尼克等人的作品。50年代初，我父親堅促我回國，也說我回國後可以到編譯館工作。當時他並且寫信給金岳霖先生和馮友蘭先生責備他們把我從放之四海皆準的數學引入唯心哲學的歧途。那時我也覺得我所學的東西回國無用，因而在數理邏輯及英美哲學之外，開始研究一點與這類工作性質相近的計算機理論。

1956年何兆開始在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參加撰寫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1962年出版）及相關的幾本書。在文革以前，何兆發表過少數論文，以及所譯羅素的兩本介紹哲學及西方哲學史的書和盧梭的《契約論》及其《論科學與藝術》。

文革以後何兆逐漸發表他大量的論文及翻譯。由於學識及經驗的累積，加以勤奮的工作習慣，質與量年年在提高增多。在論

文及翻譯之外，他曾校訂了十來本書，並用英文寫了一本《中國思想史》，編譯了一本《中國的智慧》。

何兆自己的思想，到今天為止，大部分用論文的形式分散發表。討論中國思想的文章，已見所出各集。現在這一本收入他論西方史學思想的散篇。他正計劃寫幾本系統的書。——我以為他的工作的發展過程代表了在文科研究中一條健康的演進道路。

我自己的發展過程也是由分散的文章到文集再到較有系統的書；但總覺得寫書比寫文章難得多，難度超過其長度的比例。不過我遇到的最大困難還是未能結合我專門性的工作與我在哲學方面的理想。

從1966年左右開始，我決心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哲學上。漸漸發現，像沈先生當年說的一樣，我很難用我已有的工作為基礎，加上我對人生社會問題的關注，把我在不同領域的想法，結合成一個兼容並包的全面性的觀點。——當初入大學時，以為羅素曾成功地結合了他在兩個不同方向的興趣，後來才知道他在兩方面的工作，實際上是各自為政的。

1972年夏我於出國26年以後，第一次回國，迷上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雖然有很多困惑，我覺得看到了一種以前以為不可能有的知行合一的全面哲學。——在中學時代，父親要我看一些關於辯證法及唯物主義的書，當時覺得不懂。以後在高中三年級，看了金岳霖先生的《邏輯》教科書，覺得數理邏輯容易懂。因而想先學了容易的，以後也許難的也可以懂了。

從1972年秋開始，我迷戀於馬克思主義約有7年之久；但總覺得自己對歷史及當前的事實知識不夠，因而沒有能力判斷其中哪些說法符合事實的檢驗。從1977年開始，國內公開對文革及以前的若干說法重新評價。特別是許多以前多數人並不知道的具體事實在私人談話及文學作品中披露了出來。接觸到這些資料之

序

後，我漸漸對自己近幾年的想法懷疑。覺得自己由於根深蒂固的愛國思想而一廂情願地假想了一些事實；在這基礎上搭起了一個邏輯建構，其實是一座空中樓閣。

有三幾年光景我慢慢改變自己的想法，對自己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的有些部分，特別是有關其具體應用方面的，發生了若干疑問，心理異常苦悶。大約到1981年的樣子，我開始承認自己的訓練和能力不適用於研究像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大哲學，最好還是善用自己熟悉的材料，作些一磚一瓦的工作。對馬克思主義仍希望能汲取其中我自己有力消化的某些精華。同時對中國傳統哲學也開始學了和想了一些。當我屢次覺到自己的哲學工作不能結合自己關心的人生問題時，也對馮先生所說的中國哲學的吸引力，有了較以前為深的感受。

1980年何兆來紐約，有機會常見面。記得當時我正是因為思想轉變及失去信仰而痛苦的時候，往往很多牢騷。何兆於回國前抄贈給我韋端己的《菩薩蠻》五首；其中韋莊寫了自己離鄉後心情演變的五個階段。當時我雖瞭解大意，但許多細微處都抓不住。後來看了俞平伯在《讀詞偶得》中的解釋，獲益甚多。我還寫了一篇文章，用自己在異國的鄉思，核對了五首詞中的各個階段。後來覺得文章有顧影自憐的毛病，相當肉麻，沒有發表。因此更加強了自己對詩人的羨慕。

在科技和商業佔主導地位的20世紀，不但在中國而且在別處，和何兆或我興趣大同小異的人，好像都不能不走些這種或那種的彎路。同病相憐，我自然對這類人有特殊的同情。對於這類人，我以為魯迅先生所提倡的韌性是特別重要的。

1984年何兆在紐約住了大半年，歡聚了多次。當時我正在寫一本哲學方面的書，以為有些問題是較有普遍性的，很想和他討論我的想法，可是他似乎仍覺得太專門。因此我想到自己一直缺

序

乏在專業之外有效地表達思想的能力，雖然我多年來向這個方向努力。此外也許在國內比較缺少不客氣地而認真地討論及互相批評的習慣：不怕問問題，不怕自己或者缺乏某些有關的知識。——近年來我發現由紐約打電話到北京已很簡單了。所以常有機會和何兆在電話上聊天。省去了不少寫字的麻煩。所談的共同點之一就是我們都希望真正的學術批評能夠健康地展開，既不再是大批判式的討伐，也不是無聊的吹捧，而是真正有助於學術思想切磋的討論。

是為序。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三日

自序

通常我們所使用的「歷史」一詞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指過去發生過的事件，一是指我們對過去事件的理解和敘述。前者是史事，後者是歷史學，有關前者的理論是歷史理論，有關後者的理論是史學理論。歷史理論是歷史的形而上學，史學理論是歷史學的知識論。兩者雖然都可以用「歷史哲學」一詞來概括，但大抵前者即相當於所謂的「思辨的歷史哲學」，而後者則相當於所謂的「分析的歷史哲學」。

我們通常說的「一部中國史」，可以是指中國過去所發生過的種種事件，也可以是指對這些事件的闡述和解說。史實並不等於我們對史實的理解，事實本身並不能自行給出理解，否則的話就沒有進行任何歷史學研究的必要了。我們可以認為有如此這般的事件發生過，它就是歷史。這個歷史是客觀存在着的；但我們對這個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則是僅只能在我們的思想之中進行的，它本身並不存在於客觀世界之中。如果說史實作為材料乃是客觀給定的，那麼有關它的理論，或者說其中的道理，歸根到底都是我們思想構造出來的產物。它不是現成擺在那裏的，而是我們思想勞動的結果。

有人認為我們的思想就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它即使沒有完全地、精確地反映客觀的真實，至少也是不斷地在趨近於那個真

自序

實。那個真實我們習慣上就稱爲之「真理」。不過，這就要涉及到一部例如《真理論》之類的煌煌巨著了。就日前和我們這裏的主題有關的而論，我只想明確一點，即所謂的真理並沒有一種客觀意義上的定位。真理不是北極，如果你是走向北極，你可以向北走，走到了某一點，你就可以說：瞧，這就是北極，再走任何一步就都是脫離了北極而在朝南走了。但是，我們大概永遠都不能說：瞧，這就是真理，你再多一步就背離真理了。人們的認識永遠是在前進，是一個永無休止的積累歷程，它不會停留在某一點上而不再前進。它永遠都在脫離它原來所已經達到的那一點，不斷地在超過它自己，有時候甚至於是革命式的超越，革命性地推翻原來的體系，另起爐灶。這種情形就連最嚴謹的自然科學也不例外。

能說我們的認識儘管目前還沒有完全精確地反映真理，但卻不斷地在趨於真理嗎？北極，你可以確切地知道它在哪裡，你可以確切地給它定位；因此你雖然還沒有走到北極，你可以知道你是在不斷地趨近於北極。但真理不像北極，我們無法給它定位，無法確定它到底是在哪裡。如果我們沒有資格指着某一點說：瞧，這就是真理，再多走一步就是背離它了。如果我們無法肯定這一點是在哪裡的話，我們又根據甚麼來肯定我們是在不斷地趨近於這一點呢？

我們歷史認識的進步或改變，是受到三個方面條件的制約。正由於這個三方面條件本身都在不斷的發展和變化，所以歷史學家本身也就在不斷發展和變化，而不可能是一旦達到某一點就停留下來不再前進。三個方面的條件如下：一是新材料的發現。這一點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無待多說。二是已往的歷史事實並非就已經死去了。它們在爾後的歷史發展中仍然在起作用。我們往往要根據它們的後來的效果去理解和評論它們。歷史是個不斷的

長流，已往的史實（例如孔子）對後來直迄今天和今後的作用和影響都是不斷地在變化着的，從而我們對歷史事實的理解和看法也就隨之而變。蓋棺並不能就論定。三是歷史學家作為已往歷史事件的解說者，要受其本人思想意識制約。一個歷史學家永遠不可能超出它自己的思想水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歷史。或者說，一個歷史學者之理解歷史，要取決於他自己的水平和能力。猶憶自己作學生時，姚從吾先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總是要我們讀《資治通鑑》；我讀起來總覺得滿紙不是老子殺兒子，就是兒子殺老子，毫無趣味可言，遠不如看那些纏綿悱惻的小說令人銷魂。只是後來自己年齡大了些，生活體驗也多了些，才愈來愈感覺到看甚麼小說都不如看《資治通鑑》那麼真實感人，它比甚麼小說都更加引人入勝。世上沒有人能掌握全部知識的奧妙，歷史學家不是萬能，無法掌握歷史的全部真實，何況人類知識又是不斷進步、永無止境的。沒有一個歷史學家的靈心善感能是如此之廣博而又深切，足以領會全部的人類思想感情。歷史終究是人創造出來的，不能領會前人的思想感情（如老子殺兒子，兒子殺老子之類），最多只能說是知道了（kennen）歷史事實，但不能說是理解了或懂得了（wissen）歷史。

史料或事實本身並不能自行給出一幅歷史學家所懸之為鵠的歷史構圖。歷史學家心目之中的歷史乃是（或者至少應該是）一幅歷史構圖，而這幅圖最後是由歷史學家的思維和想像所構造出來的。如果同樣的史料或史實就自行能得出同樣的結論，那麼只要根據一致同意的史料，歷史學家就不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史實本身也不能自行給出任何理論來，理論總歸是人的思想的產品。歷史事件之作為事實，其本身並沒有高下之別；但是歷史學作為對史實的理解和闡釋則有高下之別，它是以史家本人思想與感受能力的水平為轉移的。因此，對歷史的形成（即使史料形成

自序

爲一幅歷史構圖）而言，更具決定性的因素乃是歷史學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積累。各種史料都是磚瓦，建立起來一座已往歷史的大廈的，則有待於這位建築師心目之中所構思的藍圖。那是它思想勞動的成果，而不是所謂的事實在他心目之前現成的反映。

歷史學是科學嗎？大概這個問題在很多人看來會顯得是多餘的。因爲多年以來人們已經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勢，也許可以稱之爲唯科學觀點，即一切都應該以科學性爲其唯一的準則，一切論斷都須從科學出發，並且以科學爲唯一的歸宿。只要一且被宣佈爲「不科學」，這條罪狀就足以把一切理論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歷史學家彷彿理所當然地就應該是科學，完全地而又徹底地。（正有如柏里所聲稱的「歷史學是科學，不多也不少」。）然而，實際情形卻是，歷史學比科學既多了點甚麼，又少了點甚麼，歷史學既有其科學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學的一面。歷史家（作爲一種人文學科）因爲是科學的，所以它不是反科學的；又因爲它是非科學的，所以它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學的。恰好是這兩個方面的合成，才成其爲歷史學。凡是認爲歷史學是科學、或應該成爲科學的人，於此都可以說是未達一間，正如長期以來我們史學界所表現的那樣。尤其是，有些史家雖然號稱高擎歷史學的科學性這面旗幟，卻沒有認真朝着科學性的方向邁步。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觀點和方法，中國史學界不但很少有人問津，甚至於顯得是不屑一顧。例如，定量化是每一種科學的必由之徑，可是它在中國史學界研究中的應用尚未真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還談不到有甚麼重大的成果爲史學界所普遍重視。

正如在物質生活史的層次上，中國史學界對自然科學的大多數觀點和方法是絕緣的；在精神生活史的層次上，中國史學界對

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的大多數觀點和方法也大抵是同樣地絕緣。歷史乃是自由人所創造的自由事業，不是人自然先入就規定好了非如此不可的必然。否則的話，人們的「決心」、「努力」、「奮鬥」、「爭取」之類，就變成毫無意義的空話了。人既然是歷史的主人，是所謂「創造歷史的動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動（即歷史）就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核心。已往的歷史研究大多只限於表層的記敘，只把歷史現象歸結為某些抽象的詞句或概念，就此止步。但歷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靈，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體現，歷史研究最後總需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幽微，才可能中肯。一個對藝術缺乏感受力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藝術。但是不理解一個時代的藝術，又怎麼有可能把握一個時代的精神呢？一個對權力慾盲然無知的人，大概也不大可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專制帝王以至現代大獨裁者的心態。他儘管知道奧斯維辛和布痕瓦爾德屠殺了多少萬人，但是他還需要能充分解釋（理解）何以法西斯對於異己的人們懷有那麼大的仇恨（並且還煽動了那麼多的德國人）。歷史學家當然不需要親自去體驗那種生活，何況親自體驗歷史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必須有能力領會那種精神的實質，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多年來史學界雖然也研究過不少歷史人物，但超越概念而論及他們具體的心靈活動的，仍然十分罕見。對歷史學家面言，看來理論思想的深度和心靈體會的廣度要比史料的積累來得更為重要的多。史料本身並不能再現或重構歷史，重建歷史的乃是歷史學家的靈魂能力（Seelensvermögen）。對歷史的理解是以歷史學者對人生的理解為其基礎的。或者說對人生的理解，乃是對歷史理解的前提。對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對歷史有多少理解。對於人生一無所知的人，對於歷史也會一無所知；雖說他可以複述許多辭句，但是歷史學乃是一種理解，而決不是以尋章摘句為盡其能事

自序

的。

史料本身是不變的，但是歷史學家對史料的理理解則不斷在變，因為他的思想認識不斷在變。歷史事實是一旦如此就永遠如此。布魯塔斯刺死了愷撒，一旦發生了這樁事，就永遠都是如此，永遠是布魯塔斯刺死了愷撒，而不是愷撒刺死了布魯塔斯。但是對於它的理解卻永遠都在變化。例如，布魯塔斯是個反專制獨裁的共和主義者，抑或是個背叛者和陰謀家？愷撒是個偉大的領袖和君主，抑或是野心家和大獨裁者？這裏，歷史學本身就包含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歷史學Ⅰ）是對史實或史料的知識或認定，第二個層次（歷史學Ⅱ）是對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的理解或詮釋。歷史學Ⅰ在如下的意義上可以認為是客觀的和不變的，即大家可以對它有一致的認識（例如，是布魯塔斯刺死了愷撒），但歷史學Ⅱ也是客觀的和不變的嗎？我們對史實的理解和詮釋，乃是我們的思想對歷史學Ⅰ所給定的數據加工炮製出來的成品，它是隨着我們的思想的改變而改變的。假如它也象是歷史學Ⅰ那樣地一旦如此就永遠如此，那麼他就不會因時因人而異了。在這種意義上，它是思想的產物，而並沒有客觀的現實性。然而歷史學之成其為歷史學，卻全有恃於歷史學Ⅱ賦給它以生命。沒有這個歷史理性的重建，則歷史只不過是歷史學Ⅰ所留給我們的一堆沒有生命的數據而已。

歷史學Ⅱ也包含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二者的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它認同於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認同於藝術、從而有別於科學的東西，或者不妨說是某種有似於直覺的洞察力的能力。因此，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它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科學性之外的某些東西。沒有科學性就沒有學術紀律可言，它也就不能成為一門科學或學科。但是僅僅有科學性，還不能使它成其為歷史學。歷史

學的世界是外在世界和內在世界的統一體。我們對外在世界（客觀存在）的認識需要科學，我們對內在世界（主觀存在）的認識還需要有科學之外的某些東西。這裏的「某些東西」，即我們對認識歷史所需要的那種心靈體驗的敏感性，那實質上有似於藝術的敏感性。我們對外界的認識要憑觀察，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還要憑人生的體驗，否則就做不到真正的理解。這一點或許可以說是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為避免與科學一詞相混淆，我們姑稱之為學科而不稱為科學）的根本分野之一。

科學研究過程的本身，在價值上自始至終都是獨立的。科學家作為人可以有他自己的價值觀，但他的價值觀並不滲入到研究過程裏去。而歷史研究的性質卻與此不同。歷史學家在進行歷史學Ⅰ的研究時，在價值上也是中立的，這一點和科學並無不同，因為這時他所從事的工作就是科學的工作。例如考訂一件古物的年代，那推理方式和操作方法，其性質就完全是科學的。然而過渡到下一個階段，即歷史學Ⅱ時，那情形便不同了。這後一種工作就需要歷史學家以自己的心靈去捕捉歷史的精神，正如有的詩人是以自己的心靈去擁抱世界。這個過程自始至終都貫穿着歷史學家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這時候對前言往事的理解，其深度和廣度上大抵上就要取決於歷史學家本人對人生體會的深度和廣度了。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歷史學家在思想或感情上一定要同意或同情古人的思想或感情，但是他必須理解他們。歷史學家是以自己的心靈境界在擁抱世界和人生的。在某種意義上，歷史學家對過去所構思出來的那幅歷史圖象，乃是他自己思想的外燦。如果他是積極進取的，他所描繪圖象也必然是美妙動人的，如果他是消極悲觀的，則他所描繪的歷史圖象也必然是陰暗慘淡的。

史家治史包括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方面是認識史料，即上

自序

面所說的歷史學 I。這方面的操作程序是純科學的，或者說完全科學的。第二個方面是在確認史料之後，還必須對它做出解釋，這個工作是理解的工作，僅僅有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是不夠的。此外，還需要有一種人文價值的理想或精神貫徹始終。人文的價值理想和理想固然是古已有之，但它是隨着歷史的發展在發展的，它本身就構成歷史和歷史學的一個最重要的構成部分，甚至於是歷史精神的核心。科學不能自行給出人文價值的理想和精神。它雖然不是科學，但是沒有它，科學就無所附麗，就失去了依托。此外，歷史學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人性學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學和人文價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的第三個方面便是史家對人性的探微。人性探微自然也是古已有之，然而，只是到了近代哲人們的手裏，它才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們才知道原來人性裡面還有那麼多幽微的丘壑和陰影。這種探討有一部分和科學（如心理科學）重疊，但大部分卻是獨立於科學之外的。以上三個方面的綜合就構成爲近代的歷史學和史學思想。而每一個方面如果沒有結合其他兩方面，都不足以單獨支撐起近代史學的大廈。我們正是憑藉它們，才能分析和掌握過去的歷史，而且正是因此，我們的理解才能不斷前進。

所以歷史研究的工作，最後就歸結爲歷史學家根據數據來建構一幅歷史圖畫。每一個個人、學派、時代都是以自己知識憑藉和思想方式來構思的，因而其所構造出的圖卷必然各不相同，他或他們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知識和思想的能力之外和水平之上去理解歷史。當然，科學家之理解世界也要受到自己知識和思想的制約，不過他們並不是作爲思想和行動的主體的人在從事於瞭解自己的本性，也沒有人文價值的問題，所以科學之間就有一種一致公認的規範和準則，而人文學科則沒有，也不可能。人文學科（歷史學）認識的主體（人）是要瞭解他自己的思想和活動（歷

史)，這種瞭解是徹頭徹尾受到他自己的生活體驗、心靈感受和價值觀的制約的。這就使得歷史學不斷地改寫歷史。實證派的史學家每每喜歡標榜「客觀如實」。而他們恰好就在這個「實」字上面絆倒了。歷史學Ⅰ所給定的數據可以認為有一個「實」即一個大家一致（或可以達成一致）的看法。但歷史學Ⅱ並沒有數據提供給我們若干個點，而我們構思所用以掃描這些個點的曲線卻不止於一條。雖則它們之間也可以有高下和優劣之分，但這種區分大抵相應於歷史學家對人生的知識和思想，沒有那一條有資格可以聲稱是最後的、唯一的。歷史學Ⅱ本質上是一種思維構造過程，它受到歷史學家個人思想的制約。

一個畫家畫竹，須是胸中先有成竹。竹子只有一株，而每個畫家胸中的成竹則各不相同。歷史學家的成竹就是他心中所構造的那幅歷史圖畫。他的工作的完成，就在於最終把它傳達給別人，讓別人也看到他所構思的那同一幅歷史圖卷。這裡的這個「傳達」工作，嚴格說來，乃是一種藝術表現；因此也就並沒有所謂的「如實」。詩無達詁，讀者所理解或感受於原詩的，未必即是作者的原意；同理，讀者由閱讀史書而理解的過去的歷史，未必（甚至於必然不會）就是作者所要傳達給讀者的那同一幅畫面。同樣地，無論是作者或讀者所構思的畫面或者是所理解的歷史，也不會就吻合人們通常所假設的「歷史的本來面貌」。所謂本來面貌只不過是片斷的數據，而不可能呈現一幅完整的畫面。所謂歷史的本來面貌實際上乃是史家所企圖傳達給讀者的那幅面貌。這裡面已經經過了歷史學家的理解、詮釋和他的表達以及讀者的理解三重炮製。而最後在讀者心目中所呈現的那幅圖畫，才可以稱為是歷史學最後所得到的唯一結果。數據只是死數字，是經過了以上的重重炮製才賦給它們有血有肉的生命，使之轉化為活生生的人的歷史活動。這些都是由於歷史理性在進行思維（歷